

语文辞书论集

第 7 辑

中国辞书学会语文辞典专业委员会 编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书局

语文辞书论集

第 7 辑

中国辞书学会语文辞典专业委员会 编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文辞书论集. 第7辑 / 中国辞书学会语文辞典专业委员会编. —武汉:崇文书局, 2011. 9

ISBN 978-7-5403-2098-0

I. ①语… II. ①中… III. ①汉语—辞书—文集

IV. ①H1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9333 号

语文辞书论集 第7辑

责任编辑: 邵淑波

出版发行: 崇文书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B 座 430070 027-87679712)

印刷: 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140×203 1/32

印张: 13.5

版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330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403-2098-0

定价: 32.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027-87863005)

序

第七届语文辞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辑完成，语文词典专业委员会主任谭景春先生要我写些话作为序言，并说这是“责无旁贷”的，我只好遵命了。景春的意思是，我是前两届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参加组织筹备过几次学术研讨会，比较了解情况。从这点来说，由我在书前写几句话确实是应该的。但从学力上说，我知道自己非常欠缺，对各位同仁的文章，我抱着学习的态度，很难说出什么中肯评价的话。

语文辞书学术研讨会一般每两年举行一次，到现在已举行了七次。这些研讨会为语文辞书编纂者、出版者、使用者、研究者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对语文辞书质量的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语文辞书是辞书的重要门类，从语别上它是汉语的，区别于双语；从内容上它是语文的，区别于专科。语文辞书包括的面又很广，从时间跨度说，有历时和共时之分；从收录的内容说，有字典、词典、语典之分。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学术研讨内容非常丰富，与会者可以从中获得各方面的知识和信息。

每次研讨会的议题既是广泛的，又是相对集中的。中心议题往往是当时辞书学界关心的问题。比如前几年讨论较多的辞书如何贯彻语文规范标准的问题、词类标注的问题，等等。语言规范是语言学的一个永久性话题，前几年成为辞书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对于语言规范，向来存在一些不同认识，包括语言要不要规范，语言怎样进行规范，以及如何正确地贯彻执行语言规范标准。经过充分的学术研讨，大家在许多重要观点上达成了共识：语言需要规范，从而使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作用能得到更好的发

挥；人民群众的语言实践是语言规范的基础，同时也是检验语言规范的唯一标准；规范随着语言的发展而发展，规范标准需要不断完善；不同层面的问题规范手段不尽相同，语言规范要体现刚性与柔性相结合的原则。语文词典标注词类的问题，这些年很受学界关注。包括《现代汉语词典》在内的不少词典都做了标注词类的尝试。词类问题主要是语法问题，但也涉及词汇学和词典编纂中的技术处理问题。比如词的兼类问题，在词典里就表现为不同词性的义项划分问题。什么情况下不分立义项，什么情况下分立义项，分立义项后怎样分别作注，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单字如何标注词类情况更为复杂。有的单字是不成词语素，这类字需要不需要做出词性的标示？有的字分为多个义项，其中有的义项成词，有的义项不成词，成词的义项又可能分属不同的词类，这种情况下要使词类标注既科学又实用，既严密又不繁琐，是需要下一番研究功夫的。可喜的是，词类标注方面的这些问题，经过这些年的理论探讨和辞书编纂实践，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第七届语文辞书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召开，正值著名语言学家、辞书学家丁声树先生诞辰100周年，韩敬体先生在会上做了题为“大家风范和《现汉》精神”的专题发言，深切缅怀丁先生的崇高人格和他对我国辞书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研讨会上的发言，涉及规范型辞书的编写和修订，词汇学、语义学与辞书释义，字、词和语素的关系，部首系统从文字学原则向检字法原则演变等许多问题。辞书释义是这次研讨会上比较受关注的话题。

释义是辞书的灵魂，释义是否准确精当，是检验辞书质量的重要标准。我国辞书编纂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辞书释义上有许多成功的经验。王力先生总结《说文解字》释义的方法，认为其中“合理的”有五种：天然定义、属中求别、由反知正、描写、譬况。他充分肯定地说：“现在世界上最好的字典，也离不了这五

种方法。”（《理想的字典》）从《说文解字》到现在已有大约两千年的时间，我们又有了更丰富的辞书编纂实践经验。对辞书释义的研究近些年来在不断深入。如何改进辞书的释义，是各届语文辞书学术研讨会共有的议题。

在第七届研讨会上，有关词典释义问题的发言相对比较集中，也有一定的份量。辞书编者和研究者关注的不仅是注释的方法，还包括注释的语言（元语言），注释的精细和准确，注释的系统和模式化等等。一部原创的词典，编纂者对词义的发掘，都是经过归纳的过程，即对尽可能多的含有目标语言的资料（例句）的意义加以归纳——单义的只做归纳，多义的先做分析再做归纳，从而得出对词义的正确认识。资料越丰富和翔实，对资料所做的分析和归纳工作越精细，对词义的把握就会越准确。把对词义的认识，用恰当的形式表达出来，就形成词典对该词的释义。区分词的意义与结构的意义，是对语言资料充分占有并做精细分析的结果。基于这样的研究，我们才能把“有学问、有经验、有了年纪”的“有”的释义向前推进一步。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的发展，古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源头，两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个字，在古代往往是个单音节词，其词义很有可能还以不成词语素的身份存活在现代汉语中，只有关注到这样的意义，我们对某些现代汉语复合词意义的理解才能更到位。

说到这里，我想到吕叔湘先生说过的一句话：“词典是语汇研究的成果。”（《语言和语言学》）说到词典的时候，我们常用的搭配动词是“编”，实际上，应该把功夫下在“研究”上。特别是词语的解释，只有经过苦心研究才能做到准确精当。我们高兴地看到研讨会上词义研究方法的创新——把词义看成结构，把释义看作解构。上世纪80年代以后，已有学者尝试把义素分析法运用于汉语词义的分析。前面我们说过，传统的词典释义，使用的是归纳法。义素分析法则强调从相关的一组词、一群词的相

互比较中提炼词义的构成成分，使被释词的词义在同有关词的比较中更清楚地显示出来。简言之，归纳法是从大量语言材料中概括出词义，义素分析法注重的是该词与相关词意义上的差别，并把这些差别尽可能充分地在词的解释中体现出来，从而使释义更准确。同时，由于解释一个词的时候要兼顾相关的一组词、一群词，也能使释义模式趋于一致。

这本书定名为《语文辞书论集》第7辑，我觉得非常好。语文辞书学术研讨会举行了七届，前四届都没有出论文集，与会学者的论文都与其他专业委员会的论文合在一起编在《中国辞书论集》里。直到2004年第五届语文辞书学术研讨会，承办会议的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将会议论文结集在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是《辞书编纂与语言生活——第五届全国语文辞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七届语文辞书学术研讨会把论文集序号与学术研讨会的届数统一起来，预示着以后每届学术研讨会都有与之相应的论文集出版，这是个很好的开端。《语文辞书论集》作为语文辞书学术交流的园地，一定会在推动辞书事业的发展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在这里，我们还要对《语文辞书论集》第7辑的编辑出版单位崇文书局表示衷心的感谢。

晁继周

2011年6月20日

目 录

序	(1)
大家风范和《现汉》精神	
——纪念丁声树先生诞辰 100 周年	韩敬体 (1)
汉语规范型辞书编纂的历史回顾及思考	晁继周 (14)
评李尔钢新著《词义与辞典释义》	汪耀楠 (23)
语文词典编纂的文化自觉	
——关于词典类型学的思考	李建国 (34)
学习前人经验掌握编写规律	
——记辞书编写的一些经典语言	李志江 (47)
《辞源》建国 60 周年纪念版的出版与再修订	史建桥 (76)
现代汉语语文辞书释义的划界问题	苏宝荣 (87)
论形容词释义	李尔钢 (99)
汉语辞书中的字头附列字问题	程 荣 (112)
从比较中发掘词典功能优化的空间	杨金华 (124)
汉语语文词典释义的层次性分析	于屏方 杜家利 (136)
语义成分、意义的结构及释义语言研究的价值	朱 彦 (148)
从词形到词义	
——演绎法在考释复合词中的运用	金春梅 (167)
“无时无刻”的现代用法及语义分析	王 楠 (179)
汉字语素理念在《新华字典》释义中的运用	陶原珂 (192)
《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 标〈书〉词商榷	
——兼谈现代汉语书面语词问题	孙德金 (203)
也谈语文辞书释义修订的基本原则	赵大明 (217)

论语文词典科技条目知识综合性的实现	潘雪莲 (231)
《现代汉语词典》四字格双音节构成成分收立 条目的原则	王 霞 (241)
《现代汉语词典》成语释义提示语	杜 翔 (252)
微观结构设计上的两点探索 ——把造字法和口诀引进辞书	袁世全 (261)
关于汉语成语词典编纂的思考	何华连 (269)
汉语语文辞书系列化状况调查研究	王 敏 解海江 陈淑梅 (278)
汉语学习词典中文化词语的释义问题	解海江 章黎平 (290)
中小學生语文辞书使用状况调查研究	张莹莹 解海江 (305)
语文词典中网络词语的收录	王 伟 (320)
改革开放三十年汉语外来词的发展概况	张铁文 (329)
《字源》选题简介及编纂草案	王重阳 (336)
“语词分立”说的一次成功实践 ——读《现代汉语小语典》	吴建生 巫建英 (345)
学习型词典的初步尝试 ——中华书局《当代汉语词典》的总体设计构想	侯笑如 (355)
对《应用汉语词典》量词搭配标注的几点思考	叶 军 (365)
《新编小学生字典》第4版的字词处理和释义方法	谢仁友 (375)
墓石义词汇研究和大型辞书编纂	周阿根 (383)
《集韵》在辞书编纂史上的创新	邓春琴 (400)
《说文解字》部首系统的性质与特点	苏 瑞 (410)
第七届全国语文辞书学术研讨会述要	杜 翔 (420)

大家风范和《现汉》精神

——纪念丁声树先生诞辰 100 周年

韩敬体

丁声树先生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河南邓县（现为邓州市）人，23 岁北大毕业，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26 岁由于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即在学界一举成名。解放后，一直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他是一级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当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协常务委员。他学识渊博，德高望重，是公认的学术大家。他学术生涯中后半生都是从事辞书编写、修订工作，他倾力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集中体现了他的治学观念和风格。今年是他诞辰 100 周年，他那堪为人师世范的学问人生，值得我们纪念。

造诣高深的全才语言学家

丁声树先生是业内少见的学识广博的专家。他自己过谦地说“粗知汉语音韵训诂，略有方言调查经验”。实际上，他正是这些方面的权威专家。他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从训诂入手，对古代汉语的典型词语进行研究，写出过《释否定词“弗”“不”》《诗经“式”字说》《诗卷耳荇苢“采采”说》《“早晚”与“何当”》《论诗经中的“曷”“何”“胡”》等十来篇论文，材料丰富，论证严密，结论新颖，深得学界称道和权威人士的赏识。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他研究汉语语法，跟吕叔湘、李荣等先生合著的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在我国语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来他从事音韵和方言研究，成为我国音韵学和方言学领域中的学术带头人，所著《汉语音韵讲义》《古今字音对照手册》和《昌黎方言志》是业内的经典著作。他在文字学方面也有较深研究，《说文解字》他读过六七遍，在书上做了很多批注。他还同古文字学家胡厚宣先生讨论过古文字考释问题。六七十年代，他转而主持修订《新华字典》，主编《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小词典》，使这些辞书成为精品辞书。丁先生在训诂、音韵、语法、方言、词典编纂各个领域都表现出了深厚功力，并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在语言学理论研究上，虽无专门著述，但他在美国四年的考察、研究中，能成为哈佛、耶鲁两所著名大学语言部研究员、美国语言学会会员，并且常与那里的结构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研讨语言问题，其理论素养之深湛不言而喻。吕叔湘先生称他“确实是一个才学识兼备的研究工作者”。朱德熙先生赞叹道：“丁先生的学问真可以当得起博古通今四个字。”正因其学识广博，朱先生才又说丁先生“大概是主持、领导大型词典编纂的最理想的人选”。人们称赞他是全才的造诣精深的语言学家，是一点也没有过誉的。

令人称道的治学风格

（一）勤奋、刻苦，致力创新

丁声树先生读书勤、读书多是出了名的。他抓紧一切时间刻苦读书，凡是与自己专业有关的书都想方设法找来读。真可以说“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吕叔湘先生就曾经号召“在勤读书这件事情上，我们都要向声树同志学习”。丁声树先生还很重视实地调查，多方求教。由于勤学好问，丁先生才有广博的学识。丁先生治学上的突出特点就是致力于创新。他在学术研究中，能突破

前人和权威著作的窠臼，对语言现象进行新的解释。吕叔湘先生就称赞他“善于发现问题，也就是说有眼光”。他写的《诗卷耳采采“采采”说》、《诗经“式”字说》等，每篇论文都能发前人所未发，有卓识创见，为当时的专家学者所赞佩，1936年胡适就曾写信赞扬他“真是巨眼，真是读书得间，佩服，佩服”。所以1938至1941年，丁先生两年之内由编辑员而连升副研，专任研究员，成为著名的学者。上世纪60年代初，他主持《新华字典》的修订工作，深感“癌”字旧时一直读为 yán，与“发炎”的“炎”同音，会给社会生活带来不便，就听取意见，把“癌”字音改读为 ái，这一定音得到社会上的认同。还有人们经常使用的“〇”字，以往的字典中却不收录。丁先生主持修订《新华字典》和主编《现代汉语词典》，开始把它收录进去。《现代汉语词典》为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而编写，正式出版30年来，发行400多个印次，累计近五千万部，在我国语文生活中起到不小的作用。编写和修订中，丁先生从语言实际出发，纠正了前人的不少失误。在词语的释义方式、释义内容、选用例句等方面都充满了创新精神。正像《中国大百科全书》评价所说的，“远非旧词典所可比拟的”。

（二）求真务实，胆识过人

丁先生不仅不迷信书本，也从不盲从权威。他目光敏锐，善于发现问题，也敢于坚持正确的理念。解放后，他曾对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简编》中的错误提出批评，并对该书因为有毛泽东推许而无人批评的状况表示不满。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批林批孔中，他对受毛泽东肯定的杨荣国的《简明中国哲学史》提出批评，指出该书引证的一些资料出于伪古文《尚书》，所论证的殷商时的哲学思想是不科学的。文革后期，全国掀起大学“马列”经典著作的热潮。1976年，他看到《汉语大字典》编的初稿中用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话，就让人捎话给大

字典编写组的主编赵振铎先生，说这些革命领袖的话语是翻译的，用在汉语字典里面不妥当。当时文革还未结束，四人帮还在肆虐。敢在那时明确表达这种观点，实在是需要非凡的胆量的。

更能表现出丁声树先生治学胆识的，是他对待异体字表和第二次简化字表的态度。1955年12月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由于表中异体字较为庞杂，丁声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也着力整理了异体字，但并没有完全遵照异体字整理表处理。据曹先擢老师说，60年代文改会还搞出过第二批异体字表，问题更多，正是由于丁声树先生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才未能推出，不然，会给汉字的使用带来更多的麻烦。曹先生不止一次地说丁先生的做法对我国社会语文生活是功德无量的。1977年12月20日“二简”在《人民日报》上发布。第二天起各种媒体和出版单位也先后试用。1978年3月以后中小学课本都遵照指示使用了“二简”的字。而当时正在修订、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却不为所动，一点也没有反映“二简”的做法。这些学术举措足以显出丁声树先生求真务实、不随波逐流的科学精神。

（三）精益求精，从善如流

丁先生博闻强记，见多识广。但在工作中从不自恃才学，稍有疏忽。他认为，词典是供人们识文断字、释疑解惑的工具，被人们尊崇为“无言的老师”，一定要慎之又慎，避免错误。他说编写词典近二十年，词典越编越胆小，总怕出错。遇到一些拿不准的问题他总是虚心地向人求教，向一些接触实际的人求教，在语言所就常向勤杂工人、食堂采购、资料人员、刚分配来所的大学毕业生请教一些字词在某些方言地区的说法。比如向人打问北京人常说的“qi乎在一起”的“qi”写哪个字更好一些等。河北、天津有“酆”字的地名不止一处，对于“酆”的读音，他多次向来自天津的同事请教。再如山西大寨附近有个村子叫南埝，

他多次向人问“圪”字的读音，并特意让所里去大寨参观的闵家骥同志向当地问清楚。为了注释好“车皮”一词，他曾经多次向北京铁道学院的老师请教。丁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凡是有疑问的问题，见到合适的人就求教，而且是诚心诚意地请教。1978年底《现代汉语词典》第一版出版，发现“仓鼠”排错位置，他为此坐立不安，食不甘味，说这会贻误读者。为此他自责了很长时间。他十分欢迎别人对词典提出意见，他说：“我们的态度是‘有错必改’。”1978年春天，北师大陆宗达教授对《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中“不毛之地”和“圭臬”两条的注释提出批评，丁先生说陆先生提得很好，就按其意见修改了释义。事实一再地雄辩证明，要编辑出精品辞书，写出精品文章，必须有这种认真、细致、精益求精、从善如流的敬业精神。

德高望重的圣人风范

在语言所，在业界，丁声树先生德高望重，博得“圣人”称号。

（一）为人低调，不愿为官

确切些说，是他不愿做行政领导工作。1951年，所长罗常培请他出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他予以拒绝。1953年，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又出面请他任副所长，他又谢绝。1958年所长罗常培先生病逝，上级再次想让他出任所里的领导，他又是予以推辞。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胡乔木院长亲自去找他，动员他出任所长，建立一个词典编辑研究所，他还是不答应。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时任国家局局长的陈翰伯专程到语言研究所请他出任国家重点项目《汉语大词典》的主编，他也根本不予考虑。文化大革命前，丁先生曾兼任方言研究组组长（相当于后来的研究室主任）、《中国语文》主编、词典编辑室主任，负责这

三个单位全面的行政和业务领导工作。1977年，语言研究所全面恢复业务工作，所领导重组各研究机构。他坚辞了几个单位的领导职务，只保留做词典编辑室的词典主编。

（二）付出患少，所得嫌多

丁声树先生，个人生活极为简朴，对自己要求严格得近乎苛刻。他身为一级研究员，学部委员，他家的住房是他让单位按其夫人的副研究员职务分给的，一家三代住得很紧。单位曾经两次要给他调换宽绰一些的住房，他都谢绝而让与别人了。1960年到1962年，经济困难时期，政府为了照顾有卓越贡献的专家，特地发给他们副食供应证，凭它可以买到市场上的紧缺食品，他却坚决不要、不用。1951年11月，他去湖南参加了半年的土改运动，回到单位后，正赶上单位调工资。他马上找时任所长的罗常培先生反映，自己工资太多，应该往下调。他还给罗常培所长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时时感到所受太多……我的问题不是工资少，而是工资过多，变成我的沉重包袱。”丁声树先生在工资待遇上，总是嫌给予他的太多，而在工作、贡献上又总怕做得太少。后来，上级每月发给学部委员一百元津贴费，他又给郭沫若院长写信，建议取消。人大代表的车马费，他不领；文章和词典的稿费，他也不要。他总是说：“国家和人民给予我的已经太多了。”所得总嫌过多，而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又总嫌太少，这就是丁声树先生的一贯思想。

（三）不要照顾，反对特殊

他无论是办公、办事，都是坐公共汽车，从来不要单位给他派公车。他那时家住西城三里河地区，上下班都是乘坐13路公共汽车，还常常帮助维持乘车秩序，提一些合理化建议，多次受到13路公共汽车车队的表扬，被誉为“模范乘客”，车队还特地邀请他去参加年终座谈会。1976年后，语言研究所搬到较远的

地址办公，他那时年届古稀，却天天坚持坐公共汽车上班。有一段时间所里开了一辆班车，但是他没有坐两天就不坐了，因为上车晚，很怕别人给他让座。于是他下班仍然去坐公共汽车。坐公交车的人很多，也还会遇到有人给他让座，于是他就先搭乘车上人较少的快到终点站的车去终点站坐始发的回头车。丁先生上下班总是趁乘车人少的时候坐车，所以，他常常是到所里最早，离开所里最晚。他出差到外地办事，总是坐火车硬座。1975 年 5 月，国家出版局在广州召开全国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他作为著名专家应邀出席会议。作为人大代表、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他当然是可以坐软卧的，但是他硬是买了张硬座车票。当火车到站时，接站的会务组同志，想当然地到软卧车厢停靠处接他，但是车厢人都下来了还是见不到他，正感到奇怪时，他却自己提着行李从远处的硬座车厢出来了。那时他已经六十六七岁，又常年患有高血压病，竟坐了五十多个小时的硬座。丁声树先生认为自己永远是劳动人民中的普通一员，从不要组织和别人照顾。所里组织的各种群众活动，他都积极参加，如支援麦收、卫生大扫除、体育锻炼、民兵训练、集体到郊野春游等。年近古稀，他总是很早来到办公室，自己打扫房间，打开水。有一次来晚了，闵家骥同志给他打扫了办公室，他表示谢意后，告诉闵家骥同志以后还是等他自己来所打扫吧。他就每天来得更早。所里要给他办公室安部电话，他坚决不要；给他办公室放张沙发，他生气地让总务科同志马上搬走。1959 年，他带领方言组在河北省昌黎县调查方言，住在昌黎一中，也在昌黎一中教工食堂就餐。学校为照顾他们，规定在食堂早餐时他们可以买两个馒头，而其他人只能买一个馒头。丁先生知道后，要求调查方言的人不能享有特殊待遇，只能跟学校老师一样。

（四）严于律己，乐于助人

丁先生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极为节俭，但对支援国家、帮

助别人却极为慷慨。抗美援朝，国家号召捐献，丁先生把一家积蓄全部从银行提出转捐给国家。邢台地震，他和夫人关淑庄把能捐的衣物都拿出来，用三轮车拉了三车。凡是有受灾需要捐助的地方，他都尽力捐献，而且不留姓名。他对身边的同事总是给予关爱和热情帮助。有人患病，他一定会前去探望；有人生活困难，他知道后会及时给予帮助。有一位同志接到家里打来的加急电报，说是“父病危”，催他“急归”，他马上去找到那位同志，给予安慰，并送给他100元帮他以应急需。有一位青年要结婚了，丁先生给买个家具送去，并关切地询问他还需要什么。他得知一位同志家里十分困难，就让另一位同志送钱给他，并嘱咐不要让那位同志知道是他送的。丁声树先生在业务工作上也总是帮助别人，他注重关爱、培养青年人。他曾说：“我要向一些老科学家学习，发扬做人梯的精神。”他总是鼓励青年人努力学习，并尽力为他们的学习创造条件。他开列出古汉语、音韵、方言的一些经典书籍，要大家有针对性地学习。他挤出时间给青年人讲课，帮助从事词典编写的青年人掌握汉语音韵知识。他满腔热情地奖掖后学，指导青年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和写作论文。丁先生跟青年人有个约定：他帮助审看、修改的文章发表时，坚决不要以任何方式提到他的名字。他说，为别人提供资料和审改文稿，他乐意做。

（五）献身党和国家，无怨无悔

1965年，报上发表了某大学的几位大学生批判《中国语文》杂志的一篇文章。文章说这种杂志搞什么“大洋古”、“封资修”，犯有方向性的错误。当时正当批判《海瑞罢官》文章发表不久，文化领域批判之风越刮越紧，人们不知道火将烧到哪里。《中国语文》杂志被迫做出公开检讨，给了丁声树先生不小的压力。文化大革命一起来，丁声树先生在语言研究所里首当其冲，以“反动学术权威”的恶名被揪出来，挨批挨斗，戴高帽、敲小锣游